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年第 5 期 (总第 244 期)

重识司各特

宋 达

摘 要: 司各特被视为塑造"扁形人物形象"的代表性作家,凸显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及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等"伟大作家"。直观上是从技术上论述作家技艺高低,实际上提出者英格兰小说家和批评家福斯特,演绎的是主流英国文学史观,与苏格兰人对司各特的认知相去甚远,也和司各特本人的创作难以吻合。由此,追溯司各特在英国被解读的历程,以及在苏格兰被推崇的历史真相,变得极为重要。而我们在重新理解、翻译司各特作品时,需要严肃考虑司各特历史小说所涉及的苏格兰历史、英苏关系进程以及作者的苏格兰民族认同。

关键词: 司各特;苏格兰认同;苏格兰知识界;主流英国学术界;汉译史
中图分类号:I56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5-0111-09

2014 年 9 月 18 日苏格兰公投,产生巨大效应,80% 苏格兰公民参加投票,45% 选择支持苏格兰脱离英国独立,而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771-1832)的文学遗产,成为各方政治精英动员民众的重要精神资源,无论赞成独立还是支持统一。如时任苏格兰议会首席部长萨蒙德(Alex Salmond,1954-)说:"若是司各特健在,我想他会投赞成独立票的。"而司各特的后人,当时竞选保守党议员的马修·司各特(Matthew Maxwell Scott,1976-)则持反对意见:"爱国且绝顶智慧的瓦尔特·司各特清楚,我们最好是团结在一起。"[①]格拉斯哥大学皮托克教授(Murray Pittock,1962-)的《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在欧洲的接受》(2006)中也显示这种矛盾:"和拜伦、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一样,瓦尔特·司各特爵士是直接且强有力影响欧洲文学的苏格兰三位浪漫主义作家之一"[②],而不是说司各特是英国对欧洲文学影响的重要作家。令人困惑的是,司各特爵士在中国是和苏格兰无关

收稿日期:2018-07-11
作者简介:宋达,女,河南洛阳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北京 10008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爱丁堡评论》(1802—1929)与现代苏格兰文学问题研究"(18BWW055)的阶段性成果。

① Matthew Maxwell Scott, "Scottish independence: Sir Walter Scott would support the Union," in *Telegraph*, 25 Aug 2014.

② Murray Pittock (ed.), *The Reception of Sir Walter Scott in Europe*,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p. 1.

的英国作家,“全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小说家”,中国读者对其认识和估价“竟超过莎士比亚而上之……司各特是我们认识西洋文学的第一步。而他的介绍进来,对于近世文化的意义,是绝不下于《天演论》和《原富》的……司各特给予我们新的刺激,直接或间接地催促我们走向文学革命的路上去;司各特是直接或间接地奠定我国欧化文学的基础了……在中国由于他首先被介绍的特殊关系,司各特便更有了另一重特殊意义”。[①] 面对如此矛盾,深入司各特百余年汉译历程确实会发现,司各特在中国是分裂的:知道他生于苏格兰,看到他诸多作品中和苏格兰相关的因素,但视他为和苏格兰无关的思想保守落后的英国作家。而判断的直接根据,源于对其作品中温情脉脉叙述有关苏格兰历史的分析。分析的理论依据,来自译介者关于“统一的英国”概念,及所参考的主流英国文学史家的相关文献,如茅盾《司各特评传》(1924)向汉语读者提供了英国对司各特认知的重要信息。而黎君亮(1905 - 1999)概要论及托马斯·卡莱尔、丹纳等人关于司各特意见,他们对司各特赞誉有加[②];尤其是《司各特研究》(1982)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献,其中苏格兰人的评论,和普希金《谈司各特的小说》、别林斯基《关于司各特的小说》、雨果《论司各特》等6篇欧洲大陆名人论述,多为积极、正面评价,而英格兰作家和批评家关于司各特的论述,则充满否定性意见。也就是说,司各特在中国译介的割裂和矛盾,既是基于中国人意识中理所当然的英国概念,也是因为英国人对司各特的直接论述。因此,清理英国人对司各特的认识,对比苏格兰人的认知,成为重新评论汉译司各特历程的重要工作。

一、司各特在苏格兰知识界的地位

司各特发表的每部作品,都引起重要杂志的热烈讨论。其中,《威弗利》(*Waverley*, 1814)问世后,当年11月《爱丁堡评论》即发表了后来的爱丁堡大学校长杰弗里勋爵(Francis Jeffrey, 1773 - 1850)的书评,认为该作中有大量多数英国人所不熟知的苏格兰方言,“描写的时代距离我们不够久远,尚不能成为浪漫传奇,却又不算太近,也不使人感到熟悉亲切。但该作完全凭借其力量、真实性、生动色彩,使大批普通之作相形失色。超越琐碎的地方传奇,足以与备受欢迎的现代诗歌相提并论。我们认为其成功的秘诀仅仅在于作者是一位天才人物(person of genius),具有始终如一地忠于自然的道德。即使是写到最神奇之处,也只满足于描摹真实事物,而不去描绘个人的奇情臆想”,读者从中知晓作品真实而生动地描绘大不列颠北部地区的社会风俗和状况,以及1745年詹姆斯党人起义发生,与各阶级在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原则、习俗下生活相关,“这场不幸之争,最后一次凸显了日渐消亡的高地封建骑士形象、苏格兰低地生活的粗鄙”[③]。立足于苏格兰的情怀,积极发掘司各特创作中关于统一的大不列颠国家认同的论述,对认识司各特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怀俄明大学卡麦克拉肯 - 弗莱舍(Caroline McCracken-Flesher)《可能的苏格兰:司各特与明天的故事》(2005)和《司各特的詹姆斯党人的情节》(2012)、阿伯丁大学琼斯(Catherine Jones)《文学记忆:司各特威弗利小说以及叙述心理》(2003)和《历史与历史地理学》(2012),以及塞缪尔·贝克(Samuel Baker)《司各特的战争世界》(2012)等,成为司各特研究的重要著述,也得益于杰弗里书评所提供的材料。

司各特作品问世愈多,所发表的每部新作愈发引起关注。同时代人对司各特的评价大多是积极的,有大不列颠意识的苏格兰思想家和散文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 - 1881),其重要篇目《瓦尔特·司各特爵士》(1838)描述见证“《威弗利》作者”系列作品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普通读者会讲“让我躺在这张沙发上阅读无穷无尽的瓦尔特·司各特小说吧!”“这些历史小说向大家指出了真理,这条真理似乎老生常谈,但历史学家和其他作家在领悟它之前,对它却一无所知,那就是:过去时代的世界

① 凌昌言:《司各特逝世百年祭》,《现代》,1932年第2卷第2期,第276页。
② 黎君亮:《斯各德(百年忌纪念)》,《国闻周报》,1932年第9卷第42期,第4 - 12页。
③ John O. Hayden (ed.), *Walter Scot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70, pp. 79 - 84.

里实际上充满着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条约草案、公文卷宗、争论和人的抽象概念。他们不是抽象概念，也不是图解和定理，而是人，穿着浅黄牛皮上衣或别的样式外衣和马裤，面颊有红晕，胸中蕴藏有激情，具有人的语言、相貌和生命力。人是一个小小的词，却包含着多么伟大的意义！从此以后，历史将不得不把这点考虑在内。过去，历史依赖的是那种根据经验得来的哲学定义，现在则在任何地方都需进行直接观察、体验：这一点，仅仅是这点，才能算是经验；而且直到经验切实登堂入室之前，哲学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在门口等着。这是一个伟大贡献，已产生了一系列结果，这就是司各特的伟大贡献"①。能看到彭斯诗歌普遍意义的卡莱尔，也能发现司各特小说的叙述魅力及其哲学价值，对提升司各特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任爱丁堡大学教授的格里尔森爵士（Sir Herbert Grierson，1866－1960）在《爱丁堡大学学报》（1941 年第 1 期）上赞赏道：卡莱尔是第一个认识到威弗利小说对历史作家的重要性，向读者指出司各特历史小说的真理性，在其作品里，使过去时代的世界里得以充满了活生生的人。卡莱尔的意见，无论是否直接影响世界对司各特阅读，至少会因为他享有崇高的地位得到传播。

实际上，和苏格兰息息相关、苏格兰人视为亲切同胞的司各特形象，在苏格兰首先是由洛克哈特（Gibson J. Lochhart，1794－1854）塑造出来的。洛克哈特出生和成长于苏格兰，先后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1820 年和司各特的长女索菲亚成婚，后任《伦敦杂志》编辑、《布莱克伍德杂志》专栏作者。其主要著作《瓦尔特·司各特爵士传》（1837－1838 年初版七卷本、1839 年再版九卷本），记录了司各特成长历程：1779 年进入爱丁堡一所学校，表现出对苏格兰知识和大不列颠历史的强烈兴趣、叙述欧洲历史故事的非凡能力，尤其是迷恋中世纪骑士传奇和历史故事；1783 年进入凯尔索文法学校，1789 年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注意到苏格兰从封建王国到大不列颠的历史，参加文学和哲学协会，讨论苏格兰社会、历史、文学、政治、哲学等一般性问题；1792 年开始在爱丁堡任律师，1806 年被任命为爱丁堡高等民事法庭庭长。这些经历，客观上培养了司各特对苏格兰认同，有兴致搜集整理苏格兰民歌民谣，以苏格兰意识考虑大不列颠问题，由此我们明白了，涉及詹姆斯党人反叛题材的小说中，明显存在着牺牲英格兰名誉而成就苏格兰地位的意识，至于其他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以及诸多细节，都能从苏格兰历史中找到根据。② 这部传记没有因为出自司各特女婿之手而失去公信力，因有着巨大的文献价值，成为苏格兰人理解司各特的基本依据。而强调司各特的苏格兰身份的传记，对当时和后来英国社会认识司各特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以写英格兰史著称的著名史学家查尔斯·扬（Charles Duke Yonge，1812－1891）的《瓦尔特·司各特传》（1888）、爱尔兰著名新闻工作者和英国议会议员葛温（Stephen Gwynn，1864－1950）的《瓦尔特·司各特爵士传记》（1930）、著名的科学小说家和神秘小商家莱特（S. Fowler Wright，1874－1965）两卷本《瓦尔特·司各特传》（1932）等传记中，都看到苏格兰因素在司各特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决定了 20－21 世纪认识司各特的基本依据。散文家巴杰特（Walter Bagehot，1826－1877）的《威弗利小说》（1858）引证洛克哈特的意见，涉及对詹姆斯党人描写的作品，明显以牺牲英格兰来成就苏格兰，"他的苏格兰小说在描写社会的种种重大事件和活动时清楚地表露出同样的洞察力（反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民主）"，"在司各特小说里，他那富有想象的浪漫色彩的敏感性，如同讲求实际的洞察力一样明显……对历史的描写，也显示出同样的浪漫色彩。在《艾凡赫》中，中世纪的神学价值并不突出，叙述没有被教义所妨碍"。③ 作者之所以重视，是要凸显司各特此前苏格兰生活阅历及对他创作中苏格兰情怀的积极影响。

当然，更重要的，是关于司各特文学创作的讨论。巴杰特的《威弗利小说》比较早地关注到苏格兰题材小说的独特性，认为在这类作品中，"描写伟大事件、有个性的人物、怪异故事、奇特的社会状况等，以特殊的兴致，呈现作者嗜好的历史细节。特殊风俗、社会惯例，甚至中世纪苏格兰或其他地方的政治

① 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7－18 页。

② J. G. Lockhart,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Vol. 1－2, London: A. & C. Black, 1893.

③ 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4－35 页，第 44 页。

制度，皆得到细致准确的阐述，多愁善感的成分也渐渐凸显出来。这样的作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对男女主人公情感和命运的叙述"①。在他的启示下，读者可发现"威弗利小说"普遍注重背景描写，建构了独特的"司各特世界"，如爱情故事总是和某个重大事件，或伟大历史人物的命运，或某种奇特的社会状态关联在一起，作品并不期望读者全神贯注于人生的多愁善感，而是注意围绕事件展开的现场，尤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对情节展开之影响的描写。这样认识《威弗利》等小说，对理解司各特的苏格兰情怀和大不列颠国家认同，意义不可低估。格里尔森爵士，出生于苏格兰、毕业于阿伯丁大学国王学院和牛津大学，是卓有成就的英国文学和苏格兰文学研究家，在司各特研究上更是功勋卓著，先后推出《瓦尔特·司各特爵士、从男爵：新生活、对洛克哈特搜集材料的补充》《瓦尔特·司各特书信集》十一卷本（1932－1937）《瓦尔特·司各特爵士传》（1938）《司各特爵士演讲集：1940－1948》（1950）等。他认为："作家可分为两类：对人类本性与人类生活，是拒绝、抗议，还是接受、欣赏，易卜生、哈代和俄国、法国的小说家及其追随者，属于前者，而乔叟、塞万提斯、司各特等温和善良的人道主义者则属于后者"，因为司各特融合古代和现代的两种小说，"古代小说中的一切出于想象，纯属不可能的事情；现代小说总是力求表现自然，有时确实模仿得很成功……大众不太在乎现实主义文学，对他们而言，文学本质上是对现实的逃避"，司各特作为历史小说创始人，却不混淆历史和历史小说，"他既写历史又著传记，大都是约翰逊博士的风格：叙述庄重，略带些说教。他的小说不去冒充历史，作品中的事件和日期，是叙述某时期事情所可能涉及的，和历史大不相同之处在于，它们令人信服地造成我们对过去某时生活画面的错觉"，司各特不是为描绘而描绘、为风俗而风俗，认为"一个社会风俗故事要有趣，必须求助于古代"，"司各特的诗人气质在小说的精彩段落里显得比其他任何叙事诗中更为明显"。② 可以说，这样认识司各特能使我们看到，他写历史小说的成功在于，故事发生在对他而言并不完全是遥远的过去，过去时代的精神对后来者或多或少起作用，这也是《修道院》（*The Monastery*，1820）《修道院长》（*The Abbot*，1820）《帕斯的美女》（*The Fair Maid of Perth*，1828）等中世纪故事不完全成功的原因，因为它们无法与作者的苏格兰历史深情关联起来。

尤其是，以《苏格兰人及其他们的家园》（1946）等作品而著称的苏格兰小说家缪尔（Edwin Muir，1887－1959），其《作家瓦尔特·司各特》（1944）也坚持认为："一位伟大作家的不足之处，犹如白璧之瑕，应该被视为特色，而不是缺点。司各特，我们必须把这块白璧的某种属性考虑在内，这属性与它的特色或它的稀有价值不同，那就是其规模。仅仅是其卷帙浩繁，就使司各特显得奇特和惊人。他的同时代人就感觉到这点，我们亦然。在一切巨大之处，缺点也是巨大的。它们是这样的明显，以至于有些评论家的视线始终未能超越它们"，以此反驳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批评家福斯特（E. M. Forster，1879－1970）批评司各特算不上"头等的会讲故事的人"，指出"紧凑而必须的情节并不是他典型的情节。他的小说一般都有一个方向，从一点出发到达另一个点，但行程散漫，在到达终点之前兼容并包、无所不至。在《拉默摩尔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1819）中，所有的事件都把思路引向结局。但在威弗利系列小说中，我们的思绪时常被旅行中的一些变化着的景致所吸引，结局只是俗套，令人失望。但这些小说主要由中间部分组成，它们的丰富多彩全挤在首尾两个俗套之间，没有这两头，小说就无法存在，因为它总得有某种开端、某种结束。一旦开始把小说从某处引向另一处后，司各特要求从这样的情节中得到自由，实际上是探索整个人生舞台的自由，情节的繁复只是为了引起人生本来就复杂的感受。他孜孜不倦地使情节复杂化，完全是出于对人物性格和环境的无限兴趣。他十分出色地达到了这点，他的技巧使他置身于最伟大的小说之列"，从而使其对人物复杂性的描写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司各特的人物形象是完整、和谐的，是因为作家对人物复杂性之把握来自其人性的完整观念，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

① 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0－31 页。
② 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34－146 页。

形象则是分裂的，是因为他对人内心分裂的认识，但他俩都适时地说出超出其个人的代表人类的箴言。[①] 基于对司各特作为苏格兰作家的深切尊敬，缪尔在此虽然没有直接分析司各特在不同作品中因为独特表达苏格兰情怀而显露出的超强叙述能力，但把司各特创作的诗学普遍化了，从小说叙述的一般性规律赋予司各特的普遍意义。

实际上，司各特在长篇叙事诗和历史小说上卓有成就，一定程度上基于其有深刻的文学批评观念。他对中世纪的苏格兰边陲地区民歌民谣、罗曼司等文学批评意见，关于17世纪德莱顿的文学批评，对斯威夫特等18世纪文学家批评、对他同时代人文学活动的文学批评、对其自己创作的理解等，展示出一位以苏格兰意识思考苏格兰文学和大英帝国文学问题的文学批评家风采。正因为如此，爱丁堡大学圣茨布瑞（George Saintsbury，1845－1933）的《英国小说》（1913）第五章推崇司各特，“谁若不把司各特、大仲马、萨克雷划入两千年来优秀文学家行列，那么他就只能原谅别人对他的意见不屑一顾了。历史小说与纯粹的风俗小说相比有很多优点，并吸取风俗小说的主要长处”，但认为司各特远不是单纯的历史小说家，其每部小说导言都有精彩无比的短小谈话场景和人物素描，《威弗利》将历史和民族的种种成分以完全新奇方式结合为一体，展示苏格兰高原的新奇；《清教徒》（*The Tale of Old Mortality*，1816）和《罗伯·罗伊》（*Rob Roy*，1817）充满生动有力的叙述，“司各特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自己必须做什么；他令人惊奇地完成了任务，这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②]

司各特作为苏格兰民族英雄，苏格兰学术界一直很重视司各特文学遗产的整理和开发，如洛克哈特《司各特传记》（1837－38）和《司各特生活回忆录》（1839）经常再版，泰特（J. G. Tait）主编三卷本《司各特日记》（1939－46）及安德森（W. E. K. Anderson）主持的修订版《司各特日记》（1972）是苏格兰人普遍热衷的读物，以及格里尔森主编12卷本《司各特书信集》（1932－37），成为所有苏格兰人研究司各特传记的最重要资源。以上基础文献，产生了布什纳尔（Nelson S. Bushnell）《独特风格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之诞生》（1963）、德芙琳（D. D. Devlin）主编《瓦尔特·司各特：现代判断》（1968）、埃德加·约翰逊（Edgar Johnson）两卷本《瓦尔特·司各特爵士：一位伟大的鲜为人知人物》（1970）、克劳福德（T. Crawford）《瓦尔特·司各特》（1982）等当代司各特传记研究力作，也成就了布朗（David Brown）《瓦尔特·司各特与历史想象》（1979）、菲奥娜·罗伯森（Fiona Robertson）主编《爱丁堡瓦尔特·司各特爵士指南》（2012）、麦克马斯特（G. McMaster）《司各特与社会》（1981）、米切尔（Jerome Mitchell）《司各特、乔叟和中世纪罗曼司：瓦尔特·司各特得益于中世纪文学之研究》（1987）等重要著述，它们不断激活司各特历史小说的生命力，唤起读者回到关于司各特的基础文献。

然而，苏格兰批评家，或苏格兰裔或任职于苏格兰各大学的学者对司各特的热诚评价，对于百年中国接受司各特的影响力非常微弱，原因除了20世纪初林纾等人依据当时英国文学批评潮流选材之外，还因为1910年代末以来依据英国著名文学家和文学史家关于司各特的论述。而英国主流文学家对司各特的认识，却远远不同于苏格兰批评家、文学家、学者的著述。

二、司各特在英国主流文学史中的评价

《剑桥英国文学史》（第一版）用英格兰中心论主导的大英帝国文学史观建构英国文学发展历程，在第十二卷（1915）中评述司各特：“苏格兰文学在18世纪复活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激活了对其世俗化历史的兴趣。这种情形，此后因空想而徒劳无益的詹姆斯党人起事，进一步加剧。司各特强有力地延续了詹姆斯党人的癖好”，他只是对过时的历史感兴趣，“或许从未考虑过尝试写一部苏格兰生活的小

① 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151页。
② 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131页。

说"①。而彼时司各特已列入诗人角，对司各特积极叙述联合之前的苏格兰和大不列颠前史，主流英国文学史家的不屑，令人震惊。更震惊的是，作为正统的英国文学史观，对后世关于司各特的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

现代主义思潮后期，福斯特以正统英格兰人文主义批评家身份，发表影响英国和欧洲的文学批评杰作《小说面面观》(1927)，高度赞赏叙述人类复杂性的作品，对以苏格兰民族身份书写大不列颠及其前史的司各特，多持否定态度，明确声言"司各特是位小说家。我们将要对他进行无情的分解。本人认为他没什么了不起，也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一直赢得这么高的声望。他生前获得好名声是容易理解的。如果我们按年代分段法来探讨这个问题，即可看到其中有许多历史方面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我们将他从时间之河里弄出来，再放到那间圆形房子里跟其他小说家一起写作时，此人就不那么出色了。他给人的印象是：心胸狭窄，文笔迟钝，缺乏创造性，毫无艺术上的超脱和热情。一个缺乏这两者的作家怎能创作出感人的角色来呢？谈到艺术上的超脱，对于他也许是要求过高了。但以热情来说，缺乏热情就足以说明文化素养不高。大家不妨想一想，司各特在小说中写的高山峡谷以及破旧寺院是多么需要热情来描绘啊。可是我们在哪儿看到一点热情呢！如果他有热情，满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有了热情，即使文笔拖沓、矫揉造作也关系不大。但此公仅有一般的热情，也有文人的情感，从理智上对乡村也爱慕，而仅有这些对创作伟大的小说是不够的"②。苏格兰人尊为国族英雄的伟大作家司各特，在福斯特看来如此不堪，而在《印度之行》等小说中已经显露出，福斯特清楚大英帝国的严重问题在于殖民主义、大英帝国对世界的灾难性影响则因后殖民治理，但剑桥大学培养了他的普遍文学观念，把展示人文主义丰富性的人物形象称为"圆形人物"，反之即"扁形人物"，于是英格兰的现代主义诗歌和小说得到他的推崇，而推崇地方性认同的司各特则被他置于和普遍文学观念对立的位置，塑造的人物形象批评为缺乏深度的"扁形人物"。在英国小说批评和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福斯特，借助英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获得了世界性声望，他的小说理论也因此影响广泛，司各特在世界主流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大大降低和折损。由此说明，1980 年代以来虽然司各特汉译力度不减，却无助于中国确立苏格兰文学概念，原因之一是，自 1981 年《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汉译以来，至少有五个译本，它给汉语读者建构了莎士比亚和英格兰现代主义文学即伟大文学的观念。

实际上，现代主义在中国重新兴盛起来的 1980 年代，与英国女性意识流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 - 1941)再度在中国被大量译介和讨论相一致。而文美惠《司各特研究》特别收录了伍尔夫关于《古董收藏家》(*The Antiquary*, 1816)的评论，从多个方面否定司各特的文学价值，认为"有些以宁静和明朗而出名的作家，对旁人已完全失去了影响，他们只是被人享受或被人遗忘，而不是被人评论和研读。司各特就是其中之一。那些敏感、笔头犹豫不决的新手，若容易接受司汤达、福楼拜、亨利·詹姆斯或契诃夫的影响，那么他们能连一个形容词也不换，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威弗利小说。目前没有别的作品能使成千上万的读者不加批评、全神贯注，从而能开阔眼界，享受愉快。若说这就是人们阅读威弗利小说的情绪，并且会是愉快，那可能是出了什么毛病，没法为其辩护。他首先被指控的是风格恶劣。小说的每一页，确实被冗长、拖沓的拉丁文所冲淡"。此其一。其二，在他的小说中是找不到斯蒂文森那种紧凑描写的，笔法不健全、假斯文，这样去塑造人物形象，"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这种人物能如福斯塔夫或哈姆雷特那么深刻、丰满。司各特的人物有严重的缺陷，即从不思考，作者从未试图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其三，完全否定司各特经典作家地位，"把威弗利小说与托尔斯泰、司汤达、普鲁斯特的小说对比，当然会产生一些涉及到小说的根本性问题，不过用不着讨论，它们明确无误地显示司各特所不及的地方。他不属于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伟大观察家"，他创作粗枝大叶，"他的传奇故事，是晚上被追捕的人躲在森林里的传奇，帆

① A. W. Ward & A. R. Wall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X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5, pp. 1 - 2.

② [英]福斯特著，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6 - 28 页。

船出海的传奇故事,在月光下拍打浪花的故事,暴力和悬念的传奇故事"。[①] 伍尔夫从读者、语言和结构等方面否定司各特的文学史价值的论述,无论对中国的影响多少,至少显示出英格兰文学家对司各特的审美优越感,而只要正面对待这样伍尔夫,必然要接受其贬低司各特的主张。

而贬低司各特的文学史意义,是英国主流文学家的普遍现象。普列奇特(Victor Pritchett,1900 - 1997)的《充满生命力的小说》(1946)讨论司各特时说:"我们在儿童时代阅读司各特作品,但他的作品不适合儿童阅读。为何一个饱经沧桑的、被这个世界打上邪恶烙印、血液里注入了这个世界悲哀和经验的人,他成年时期创作的作品,竟然要指定给那些对自己和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少年们阅读呢?铸成这一错误的部分原因在于,司各特这位在英国小说界享有莎士比亚才能的伟人,过于经常地描写使受过上好教育的年轻读者为之倾倒的男女主人公——呆头呆脑的理想化人物,他们是我们那些有更好教养的少年心目中理想的缩影。我们16岁时爱慕那些模仿严肃的女教师口吻的缺乏性感的女主人公,爱那些顽固守旧的男主人公,他们正直无私,忠于荣誉,害得我们少年们都迷上讨厌的虚妄的理想主义。在司各特臆想出来的白日梦中成长起来的读者,后来发现那是一场诓骗,这位读者就绝不会原谅他……视司各特为历史小说家,是我们童年时代阅读作品时容易产生的一种误解,其实我们更有理由把他看作喜剧作家。"[②]他仔细分析《黑侏儒》(*The Black Dwarf*, 1816)的糟糕之处,充满着大量使人费解的虚构内容、中心情节离奇,指责《密德洛西恩监狱》(*The Heart of Midlothian*, 1818)叙述过程违反了心理学、伦理学,断言主人公珍妮是使读者难以容忍的形象。实际上,《密德洛西恩监狱》之所以不被他看好,乃因该作是以1736年爱丁堡发生反大不列颠政府的迪厄斯骚乱为背景,严肃指出苏格兰问题是大不列颠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议题,苏格兰命运和英国自由主义、英格兰命运关联。这样的背景和主题,是英格兰作家难以接受的。

问题是,主流英国学界普遍如此评价司各特。桑普森《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中司各特的篇幅不小,但其文学史意义基本上限定于苏格兰文学范围内,其英国文学史上作用难以彰显。在现代主义风行中国之际,桑普森汉译本无疑加剧了司各特在中国边缘化的处境,与当时加大司各特作品翻译量的情况矛盾。七年后,桑德斯《简明牛津英国文学史》(1994)出版,情形并未改观,对司各特的论述同样充满矛盾:一方面承认"相较于玛利亚·艾奇沃斯在鼓励爱尔兰人认同大不列颠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司各特小说对促成苏格兰人认同大不列颠的作用则更甚","他希望能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事,就像艾奇沃斯小姐有幸把自己的同胞介绍给兄弟国家那样,使人们对苏格兰历史和文化及其活力、矛盾有更广泛通俗的理解。如果说他有时因按苏格兰反对英格兰政治和文明模式的传统,做了一些净化工作而受到谴责,那么他确实成功地探索并解释了被英格兰文化帝国主义和苏格兰社会进步论者所忽略的北方历史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又违背史实地认为"司各特作为小说家和诗人,其创作有意识避免使用苏格兰方言,以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读者接纳","通过丰富、探究和想象民族历史的某些重要方面,司各特成功地分析了历史进程的一些情形。借鉴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并对按叙述文体改造戏剧的方法,把政治和喜剧,与历史和小说相混合,塑造苏格兰民族性的不同方面",断言"悲催的是,疾病和债务",使司各特晚期作品"带有疲惫衰退的痕迹,实际上已经变成散漫芜杂却包含着激情的试验作品"[③]。具体分析《威弗利》时,针对涉及1745年詹姆斯二世支持者的叛乱事件,认为该事件启动了英国变革,"自此逐步累积财富和扩展商业贸易,使现在的苏格兰人不再同于他们的祖辈,就如同现在的英格兰异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先辈们那样",人物不再是哥特式小说中那种打扮怪异、故事情节也不再奇异,虚构的英雄不能偏离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他们的行为是由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有着苏格兰的历史和地理因素。有意识不论及司各特和苏格兰关系,却说1820年《艾凡赫》出版后司各特突然转移了方向,"远离苏格兰,远离最亲近

① 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北京: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216 - 220页。
② 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 - 155页。
③ [英]桑德斯著,谷启楠等译:《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 - 387页。

的人们所记忆犹新的历史”，认为《艾凡赫》《十字军英雄记》（*Tales of the Crusaders*，1825）《未婚妻》（*The Betrothed*，1825）三部以十字军东征为背景的小说，充满着夸张且冗长叙述的历史细节，与司各特此前的苏格兰题材小说之生动而朴实的地方语言形成鲜明对照，并且对涉及苏格兰历史和大不列颠问题的《肯尼沃斯城堡》（*Kenilworth*，1821）等作品，也未积极讨论。矛盾性论述，综合反映了英国主流学界的基本认知，即把司各特的意义限定于苏格兰文学，把他放在英国文学框架下查考，在题材、叙述技术等方面悖谬颇多。

三、司各特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中国司各特汉译历程，每个时段均受中国局势左右，但长时段则显示出，更受“统一英国”的概念及其衍生的英国文学史框架认知所影响，基本上不清楚苏格兰人对司各特的理解。茅盾关于林纾《撒克逊劫后英雄略》1924 年版序言的《司各德评传》指出：“法国大革命的潮流，震撼当时人心，至极强烈，全欧文坛为之变色，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等人皆被大革命的潮流所冲激，高呼打倒专制魔王，人人平权；但司各德对那时抉破旧思想藩篱的平民主义，非但一点不热心，并回过头来赞慕那过去的帝王的黄金时代”，并引用英国史学家弗里曼《脑门豆人征服英国史》（脑门豆人即诺曼人）考据撒克逊人和诺曼人矛盾历史，断言“司各德所言两族水火的情形，没有历史的确定性。司各德之所以要如此，大概想藉此增加艺术上的趣味”。[①] 暂且不论其中的知识性错误，至少显示出，中国译介司各特，除了在文学观念和有关司各特的知识方面，完全没有关注苏格兰知识分子论述，更多是转述英国主流学术界的意见。正因为在汉译英国文学历程中不知晓苏格兰关于司各特的认知，缺乏“苏格兰文学”概念，司各特尽管在中国是译介较早、作品翻译量较大的苏格兰作家，也无益于译介者关注到司各特成为伟大文学家的关键在于充分表达苏格兰民族认同，也没有使汉语读者借助大量的司各特汉译作品，去理解苏格兰问题、建构苏格兰文学概念，司各特充其量是一位英国通俗历史小说家而已。

中国最早翻译司各特的林纾，把司各特比附太史公，即其用文学准确传达了历史，而实际上，林纾本人痴迷于翻译司各特，则因其小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沈从文赞赏司各特也并非因其对历史的独特叙述，而是叙述本身，“能叙述故事编排故事第一流高手”[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而钱青《英国 19 世纪文学史》（2005）的相关论述，显得弥足珍贵，认为司各特继承 18 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不同于渲染浪漫情调和神秘气氛的“哥特式”传奇小说，“如果他经常停下来作人物心理分析，或者追求新奇的意象，那么他的故事速度和戏剧性就会受到损害。他所追求的是气势，因此要写得有力：是历史的魅力，因此要有英雄美人，要有大背景、大格局”[③]。

因此，苏格兰文学批评史上还原司各特的文学地位后，再来梳理司各特作品译介史，应该注意到，苏格兰历史知识，尤其是被审美化了的苏格兰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人文境遇等，是构成苏格兰文学，尤其是司各特苏格兰系列的主体性内容，也是司各特小说和诗歌魅力之发生的基础。勃兰兑斯说：“司各特 15 岁时，他开始接触到风景优美的苏格兰高地，这一带地方不久就对他具有极大价值，以一种欧洲人前所未有的独特自然风光，为小说中的人物提供了活动背景。从他产生当诗人的愿望的那一刻起，他便以画家写生方式研究大自然。每当提要描写某一个地区，他总是先要去那个地区旅行一番，对那里的山丘面貌、丛林方位、树木形状、某个时刻云彩变化的轮廓和特征，都一一记录下来。他甚至会记下路边或洞口的某一束花或一片灌木丛是什么模样。他同德国和丹麦的浪漫主义派一样，能以诗人眼光欣赏大自然，但这不妨碍他描绘环境背景时那种有力而精确的写实主义。”[④]“风景”不仅成为他历史小说的重要

① ［英］司各德（特）著、林纾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年版，第 4、27 页。
②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937－1949）》第 4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462 页。
③ 钱青主编：《英国 19 世纪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年版，第 93 页。
④ 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版，第 71－72 页。

内容，也是其早期诗歌的重要意象。格里尔森《司各特其人其诗》(1941)认为“司各特把对大自然的爱，对具体地方之爱，对热爱苏格兰历史的人的联想，都编织在这些地名之中，主导的情绪可能是热情，而不是深层意义上的激动”，从而在一般意义上和推崇对自然风光的自然哲学思考的华兹华斯区分开来，也不同于在激动描写不同地方的风景时，为了表达政治激情的拜伦。① 对此状况，阿伯丁大学司各特研究中心主任拉姆斯登(Alison Lumsden)的《司各特和语言的有限性》(2010)在逐一论述司各特作品的语言特点时，强调理解其小说的困难，认为既有使用苏格兰语方面的，包括词汇、俗语、谚语等，也有为塑造主人公形象所构建的独特历史背景、具体语境所涉及的复杂知识。的确，在《威弗莱》《古董收藏家》《中洛特郡的心》《雷德冈托里特》等小说中，苏格兰和英格兰的风景无处不在。对于司各特小说中的风景描写问题，拉弗(Mary Lou Laffery)《〈威弗莱〉系列小说中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风景艺术》(1971)、里德(James Reed)《瓦尔特·司各特爵士：风景与位置》(1980)等，结合司各特具体作品，论述苏格兰或英格兰风景描写所传达的复杂寓意。尤其是，独立作家达比(Wendy Joy Darby)《风景与认同：英格兰的民族与阶级之地理》(2000)，根据英国文学作品所描述的英格兰风景，以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自然景物的个人化描写所成就的英国浪漫主义特殊品格，建构了英国是风景如画的国度，且主要是分布在英格兰，即英格兰有着更多浸润着历史文化名人足迹的风景，显示风景在浪漫主义时代所包含的深刻价值。而这却不是中国的文学知识所能理解的，比如孙毓修的《司各德迭更斯之评论》(1913)即把司各特历史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相比，指出“作小说者，以无为有，随笔点染，妙造自然，其足以颠倒读者，惹起迷信，亦有此境”，“司各特小说虽原本于史，而大半皆逞其臆见，向壁虚造”②，远离了司各特风景描写背后的民族认同所指。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甚至重新翻译司各特含有大量苏格兰风景描写的作品。

可以说，二百多年来，苏格兰留下了关于司各特文学批评的丰富成果，包括传记、文学作品分析、作家民族身份等文字，负载了关于司各特文学遗产的知识。然而，与司各特以伟大文学家的身份纳入苏格兰国族英雄相反，司各特虽然在19世纪末进入西敏寺，但苏格兰关于司各特的热烈讨论，只是很有限地触动了主流英国文学史框架下的司各特之论述。如此，关于司各特，苏格兰与英格兰主导的英国主流学术界，近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认知。而20世纪中国对司各特的理解是远离苏格兰学界的，汉语读者从茅盾相关论述、文美惠《司各特研究》(1982)中获知这些矛盾，但因为整体上是在主流英国文学史框架下译介司各特，而不是在苏格兰文学史进程中给司各特定位，对司各特作品中的历史事件、人物形象及其背后所传达的苏格兰情怀，少有明确感知，直到21世纪才很有限地与苏格兰认同关联起来。也就是说，百余年来的司各特译介，未能启示中国人去认识苏格兰文学和苏格兰问题。

总之，百余年来，司各特大部分作品得以汉译，成为大量译介英国文学的资源之一，与司各特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接纳相呼应，对未来我们重新思考司各特创作中所蕴含的苏格兰民族认同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本根据。然而，由于中国尚未明确“苏格兰文学”概念，也就不清楚司各特在苏格兰文学史上的位置，不查证英格兰和苏格兰关于司各特认知上的差别、对立，未能在苏格兰文学史中准确定位司各特，司各特作品即便汉译繁多，也仅局限于通俗作品领域。进入21世纪，中国在认识司各特方面有少许进步，但对二百年来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司各特批评史的不同，依然缺乏了解，司各特作品汉译再多，也无法和苏格兰认同、大不列颠问题等关联起来，更没有探讨他所深入思考的苏格兰高地和英格兰化加剧的苏格兰低地之间的矛盾问题，而且这种矛盾至今存在，2014年公投计票结果显示，爱丁堡及以南区域，反对独立的比重明显增加，与欧洲的阅读水平相比显示出严重不足。

(责任编辑：素微)

① 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
② 孙毓修：《司各德、迭更斯二家之批评》，《小说月报》，1913年，总第4(3)，第16页。